

语言比较研究方法论考察

张从益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21 世纪的语言科学已走出被冷落的角落, 伴随着世界性文化运动而成为一门显学。中国的文化语言学与西方的认知语言学遥相呼应, 成为语言学史上股不可阻挡而滚滚向前的急流, 这股急流业已汇入重形式的现代语言学的大潮中, 其趋势为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走向浑沌, 昭示着语言比较研究方法论的趋新。

关键词: 语言比较; 方法论; 考察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5)04-0518-04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 比较语言学在世界不同地区有了不同的发展: 主流比较语言学在欧洲, 其发展的理论基础从生成语义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到认知语言学, 切斯特曼从“外向”(outward)和“内向”(inward)视角对语用学和语言使用者的心理进行深度的描述, 彦姆斯则从“纵向”(vertical)和“横向”(horizontal)视角对超越句子层面进入篇章和结合语用和文化进行“高”和“宽”两个维度的探索; 美国则是对比修辞学的阵地, 其理论基础继承了沃尔夫的思想, 在跨文化研究和书面语写作的对比研究上有着自己的特色; 澳大利亚以维尔茨皮卡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沿着沃尔夫的路子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工作, 他们的研究成果非常值得重视^①; 中国大陆以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为依托的一批学者, 以全球的研究为背景, 从文化语言学视角来促进中国与世界在比较语言学领域的相互了解和增强互动。然而, 语言科学思维框架的转换, 随着各学派单挑独斗的语言比较研究方法论所形成的格局已预示着语言比较研究方法论有滞后于 21 世纪语言科学发展的可能。因而, 只有聚众家之长, 并加以发展方能应对。

与篇章语言学》一文。文中提出了篇章研究的四种模式, 以及相应的四种语言比较研究模式。其中认知篇章研究模式(Cognitive text models)以及与其相应的认知范畴与文化图式(cultural schemata or frames)和互动篇章研究模式(Interactional text models)以及与其相应的社会语言传统和文化传统的比较研究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②。

在中国, 文化语言学的兴起把语言研究纳入整个文化研究的广阔天地, 使语言研究更具有民族特色, 更有应用价值, 因而也就更有活力, 更有吸引力。可以相信, 文化语言学的兴起对改变语言学在学术界孤立的现状, 对繁荣语言文化事业, 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文化语言学并不能完全取代现代语言学。如汉语的结构、运用与发展, 仍有许多情况是由语言内部规律决定的, 跟文化没有直接关系。如音位的对立与互补, 区别性特征, 语言系统的平衡律, 词义从具体到抽象的派生律, 词的语法功能分类, 这些是在任何语言中都起作用共同规律, 都不能以汉语特有的“人文性”来解释。即使是汉语的特点, 也不都同“人文性”有关。如舌尖元音的存在, 轻唇音的出现, 复辅音的消失, 形容词的接近动词而非名词, 诸如此类的大量课题, 都是“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1]。

文化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它们各自的研究方法及侧重点不同, 刚好可以互相补充, 使我们对语言现象的分析和认识更为全面, 更为深刻。比如汉语词汇的复音化现象, 如果从形式

收稿日期: 2005-03-01

作者简介: 张从益(1953-), 男, 湖南湘潭人, 中南大学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英汉语比较研究, 中西文化比较研究。

着眼,我们可以统计出复音词在各个时代的词汇系统中所占的比例,可以去摸清复音词当中各种不同的结构方式在历史发展中的消长情况,可以探讨复音化跟语音、语义的关系等等。如果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复音化现象,我们可以探讨复音化跟民族文化心理有什么联系,何以有些结构方式十分能产,有些则未能充分发展,复音词的发展规律对其他学科有何借鉴意义等等。如果没有具体事实的描写,文化角度的阐释则未免空疏。如果没有文化角度的加工,对语言现象的认识就有可能不全面,甚至是错误的,形式的描写就不能升华,难以溶进其他文化领域,其价值也就得不到充分的体现^[2]。这样看来,文化语言学完全可以和重形式的现代语言学携起手来,共创辉煌。

显而易见,芬兰学者恩氏的“认知篇章研究模式”和与其相应的“认知范畴与文化图式”,“互动篇章研究模式”和与其相应的“社会语言传统和传统文化的对比研究”,以及中国学者的关于文化语言学与现代语言学关系的研究,都充分地说明了语言认知模型(cognitive models)对文化模型(cultural models)的客观依赖,说明了语言认知与文化互动的本体关系及语言对比的深刻内涵,从而论证了语言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语言对社会实际的依附性,以及社会实际将决定语言学的走向的观点。

当今的社会实际是科学的发展在分析方法登峰造极之后,正朝着大综合的方向前进,多学科交叉成为科学发展的普遍趋向。语言学的大综合性质,从表面来看,就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结合,在方法是归纳和演绎的结合,在时间上是历时和共时的结合,在范围上是外部语言学和内部语言学的结合;但从深处来看,这种结合并不是正反相加,而是在一个崭新的层面上实现划时代的变革,这就是要完成一次思维框架的转换^[1]。这一重大变革的新动向就是现在已被科学界公认的多学科交叉发展的普遍趋向,而这里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混沌学(Chaos)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自然科学中发展起来的混沌学理论已在众多学科领域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并且都已获得显著的进展。所谓混沌学,用最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一门以直观、整体为基点来研究混沌状态的复杂规则性的学问,它认为“混沌状态是一种微观上有序有律、宏观上无序无律的状态。混沌状态既有复杂性,又有规律性;在混沌的无序无律后面,却又体现着深层的有序有律。”^[3]。

以往的语言学只把语言看成是一个线性系统,

历史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研究语言使用的都是线性分析的方法。其实,语言分析中存在大量非线性问题。线性系统最基本特点是具有叠加性,即两个输入作用之和引起的行为响应等于它们分别引起的行为响应之和。例如:“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就具有叠加性。不具有叠加性的系统,是非线性系统。客观世界中存在着无数这种非线性的行为事实。如俗话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就不具有叠加性,属于非线性系统。语言的分析也是如此。浑沌学之于语言分析,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如后代语言对早期语言“初值的敏感依赖性”,语言变化中的“分叉”“涨落”和“内在随机性”,语言对文化整体的“层次自相似性”,以及语言系统的“平衡破缺”,语言中游离现象作用于“奇异吸引子”等,这些引号中的浑沌学术语所反映出来的语言学问题都是语言研究和语言比较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但都是过去的语言学和语言比较研究所未曾涉及的^[2]。

毋庸讳言,从总体上看,语言比较研究方法论实有滞后的可能。比如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如果只采用彦姆斯的“纵向”和“横向”的观点,或切斯特曼的“外向”和“内向”的观点;或美国的比较修辞学方法,或澳大利亚的语言比较研究法,或中国的语言比较研究法来分析,势必都难以对其作出恰当的解析,当然就更谈不上比较了。

二

语言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符号世界,而是一个开放的、演化的、有着大量外界干扰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不是一个确定性的、简单和谐的模式,它常因系统内部一些微小的不确定因素或来自系统之外的某些微小干扰,而发生巨大的、不可预测的波动。这就需要用混沌学的理论和方法加以把握,也就是说要以一种立体态势的语言比较研究方法加以把握。这种语言比较研究方法要求我们从历时和共时相结合的角度来考察西方和中国的比较语言学研究史,遵循去粗取精、古为今用的原则;深刻分析当今各国在比较语言学领域的研究状况,遵循博采众长、中西合璧的原则。

这一立体态势的语言比较研究方法是采用彦姆斯的“纵向”和“横向”、切斯特曼的“内向”、美国比较

修辞学、澳洲语言学和中国比较语言学相结合的一种立体态势的语言比较研究方法论。这样,如果说彦姆斯的“纵向”和“横向”代表了“高”和“宽”两个维度的话,切斯特曼的“内向”又增加了“深”这第三个维度,加上美国比较修辞学从侧面、澳洲语言学从背面推动^①,中国的文化语言学从底部(底蕴)支撑,语言比较研究方法论将会更好地为语言比较研究和第二语言教学服务。

遵循这一立体态势的语言比较研究方法论,我们方可对语言事实或语言现象予以恰当的比较,这从运用这一立体态势的语言比较研究方法论对柳宗元《江雪》的解析可见一斑。

从彦姆斯超越句子层面进入语篇的“纵向”看,意象一般以两种形态出现于文学作品中,即单个意象和整体意象。单个意象就是文学作品中最基本的艺术形象,整体意象则是一组或一串意象构成的有机的整体画面,也称意象体系。《江雪》中的“千山”“万径”“孤舟”“蓑笠翁”和“寒江雪”等就是单个意象。人们常常又把这种意象看成是更大境界中的一个“部件”。它们不能离开整体,若离开了,单个意象就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比如“鸟飞绝”和“人踪灭”一旦离开了《江雪》,它们便失去了这首诗赋予它的“不屈而又孤独”的色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江雪》韵味独特,即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内蕴着部分与整体的结构关系,其结构显示:诗中“千山鸟飞绝”与“万径人踪灭”和“孤舟蓑笠翁”与“独钓寒江雪”之间具有叠加性,属于线性系统,因而是有序的。但诗中的“千山”和“万径”分别与“孤舟”和“独钓”之间均不具叠加性,属于非线性系统,故为无序的。

从彦姆斯结合语用和文化的“横向”分析,诗中的“千山-鸟”和“万径-人”分别都是中心对称,他们各自之间都有着必然的一致性和同一性,即山中必有鸟存,路上必有人行。而“千山-鸟飞-绝”和“万径-人踪-灭”则是非中心对称,他们之间具有偶然的非一致性和差异性,即山中本应有鸟,路上本应有人,但却“鸟飞绝”“人踪灭”。

从切斯特曼特别依赖认知语言学的“内向”窥视,在非中心对称的后面,却又体现着深层的“有序有律”——“绝-灭-孤-独”。认知语言学的方法表征“经验观”显示,《江雪》中意与象俱的意象构造过程源于意象的选择和意象的组合。意象的选择是第一步的,意象的组合则是第二步的。意象组合是指客观事物的现象或映象触发了作者的灵感,作者捕捉到了主要意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调动生活

的积累,神与物游地展开想象、联想,使主观的思想感情与客观生活中的多种物象相交相融,相契相合,逐步地臻于统一,在勾画出整个诗篇脉络的同时,创造出意与境谐的诗的艺术境界^[4]。很显然,诗中所显现的“大自然”的特征与“诗人”的心境是作者所经历的部分,远远超出了客观的描写。认知语言学的方法表征“突出观”表明,诗中“思”与“境谐”的意境营造过程在于意境的创造。所谓意境,是指作品通过意象组合所描绘出的生活图景,与诗人主体审美情感融合为一而产生的一种艺术境界,是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能诱发和开拓出丰富的审美想象的空間的整体意象。换言之,意境是意象的高级形态,也是文学典型化原则在诗歌创作中具体运用的审美结晶^[5]。遵循其典型化原则追寻去,《江雪》的写作思路是诗人眼中先见某物,后托物言志,即“物象的情思化”。这就是说,诗中的“千山”和“万径”相对“孤舟”和“独钓”来说是诗中最有趣、最突出的部分,因而能把诗人既在物(钓鱼)中找到了自我,又在物(雪)中消失了自我的这种“情感”完美无缺地表现出来。究其原由,我们必须了解柳宗元当时的处境与心境。当时正值唐贞元十九年,诗人满怀激情,积极参加王叔文集团的革新活动,但无奈革新失败,他被贬为永州司马;就其心境来讲,诗人精忠报国,却因刚正不阿遭受迫害,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心底充满了无比的压抑和孤寂。理解了这些,我们便会恍然大悟:原来,柳宗元是借描写山水景物,歌咏隐居的渔翁,来巧妙地表达自己不愿与当权者同流合污的内心世界。诗中孤寂的背景正是当时严酷现实的折射,渔翁独钓的孤傲恰是诗人自己心境的投影。

从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底部”支撑看,“现代心理学前沿研究趋于认同的是,具备创造性价值的艺术灵感,多数是在创造性任务的驱动下,创造者对贮备在自身认知深层的文化底蕴和早期文化经验的重新组合,从而爆发出新的艺术观念。”^[6]可见,诗中所表现出的“心物两契”具有民族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底蕴特征。《江雪》中的“托物言志”,其“物象的情思化”达到了“物我交融”“心物两契”的境界,即,在茫茫的大自然中,诗人既在物(钓鱼)中找到了自我,又在物(雪)中消失了自我,老渔翁这个诗人的自我化身和大自然相互交融,浑然一体。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思想里,和谐与自然是相通的。自然即和谐,和谐即自然。这里的自然,不是西方自然法意义上作为超验存在的自然(Nature),也不是与人文世界相对立的自然世界,而是自生自发、自然而然的自然

(spontaneity)。它被看做宇宙之本根。这种意义上的自然和谐(spontaneous harmony)是本有的、普遍的、当下的,无需人们立于人文世界而向外寻求。因为人文与自然(nature)、人道与天道及万物之理,皆归于一。“本根之理,即人伦日用之理,在人为性,在物为理,在事为义,都是宇宙本根之表现。”^[6]

从澳洲语言学所关注的内在意义与心理的“背面”看,“意象”这一概念都包含两个内容,即“意”和“象”。前者为主观,后者为客观。主观的“意”要通过客观的“象”来表现,客观的“象”是主观的“意”的表现方式。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它是主体与客体在人类社会实践相互作用的产物。这就说明,社会环境构筑了不同的文化类型。

最后,从以二语教学为指归的美国比较修辞学的“侧面”考察,诗中“千山”和“万径”对仗,“孤舟”和“独钓”对仗,若干个意象互相烘托映衬。第一句借“鸟飞绝”表现山之高,第二句通过“人踪灭”表现雪之厚。第三句描写一位披蓑戴笠的老翁在一叶扁舟上醉心钓鱼。第四句才点出雪。

对于从事语言比较研究的工作者来说,建构一种以上所述的,即与当代语言科学发展趋势相适用的“立体态势的语言比较研究方法论”乃当务之急。它关乎语言比较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它涉及语言教学的成效,尤其是第二语言教学的成效。这是因为“只有当人们看到语言这一观念有这么多种体现,并

能对不同民族的语言特点从个别和一般两方面进行比较和对比之后,才能更清楚地理解一个民族的语言及其语言特点。”^[7]

注释:

① 潘文国. 西方的对比语言学研究. 中国英汉对比研究会会议交流论文[C]. 2004.

参考文献:

- [1] 张公瑾. 走向21世纪的语言科学[J]. 民族语文, 1997, (2): 28-35.
- [2] 刘伟安. 文化语言学研究[J/OL]. <http://lib.blu.edu.cn/byslw.txt47K>, 1999-11-26.
- [3] 王德胜. 走向混沌? 走出混沌? ——有序与无序的疑难[J/OL]. <http://www.xhedu.org/dzts/q/gljx/ts009036.pdf439k>, 2004-12-11.
- [4] 刘沛. 音乐成就测量与评价的认知主义方向[J]. 中国音乐, 2001, (4): 29-30.
- [5] 王玉琴. 意象. 诗歌写作的焦点[J]. 语文月刊, 2001, (7): 25-27.
- [6] 夏勇. 人权概念起源[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 [7] Humboldt, Wilhelm Von.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languag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different periods of language development[A]. Essays on language/wilhelm von Humboldt[C]. Frankfurt am Main: Lang, 1997.

On methodology of language comparison

ZHANG Cong-y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linguistic science of the 21st century has gone out of the unfrequented corner and become noticeable with the world-wide cultural movement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hich Chinese cultural linguistics and Western cognitive linguistics which once developed in a parallel way have coordinated with each other, and have combined with modern linguistics, marching into the chaotic state, which makes clear to all a corresponding methodology of language contrast and comparison.

Key words: language comparison; methodology; study

[编辑:苏慧]